

《中華民國發展史·社會發展》

流動的社會：人力資本、社會結構與資源分配

蔡瑞明（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葉秀珍（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一、導論：流動社會的出現

社會流動的形式

社會流動意指上下兩代間或個人在勞動市場的職業地位的轉變。職業是現代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之一，職業地位的變動，無論是在實質與象徵層面上，對個人的意義都是很重大的。本文將以社會流動的議題來討論我國百年來在人力資本、社會結構與資源分配的變遷，並呈現近百年以來，台灣社會如何經歷這個轉變的過程。社會流動主要發生在家庭與勞動市場。個人與其父母親在職業地位的異同，代表個人的代間社會流動；個人在勞動市場的職位變動，則為個人的代內社會流動。當個人的職位比他的父母親來得高時，他就經歷了「向上流動」；反之，則他經歷了「向下流動」。同樣地，在職業生涯中，個人也會因為職位的升遷降級而經歷向上或向下流動；由於是個人職業生涯內的流動，又稱為代內流動。社會流動意味著個人的職業或職位的取得，流動過程中會衍生出社會的資源分配形態。

一般而言，社會所需的人才是會隨著產業的需求而變動，當經濟結構發生變化，需要更多特定的人才時，就會創造出新的職位，提供更多流動的機會。這樣的型態被稱為「結構性流動」，是過去台灣社會代間流動的主要因素。經濟的成長與轉型、教育促成人力資本的提升，共同促成了近百年來，我國自農業社會轉型成以工業及服務業為主的趨勢。一個流動的社會於焉開展，影響了每個人的生

活。在傳統以農為主的社會，大部份的人們一輩子待在農村，從事與農業有關的工作；那時候，沒有明顯的社會發展，也很少有社會流動的機會。父傳子承、世代務農，是最常見的模式。個人並未接受正式教育，工作的選擇也不多，鮮少有人離開家鄉出外工作。這樣的社會圖像，隨著工業化的過程而被打破。伴隨台灣工業化的後果是兩代間的職業類型與內容，出現了明顯的差異，越來越多的子代不再也不能繼承父母親的職業。農業部門在整體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滑，新興的城市與工業區提供大量且多樣的工作機會。無論是出於自願或是被迫的，人們開始經歷的大幅的流動，形構出一個「流動的社會」。

當新的一代必須離開家園、在外地的勞動市場找到工作時，他們往往得透過家庭外的管道習得謀生的技術。從學徒制、「做中學」的歷程、到後來普遍的國家教育體制，無論是非正式或正式的教育與學習，基本上是為了學得各種工作的技術與能力。個人的能力與工作的多樣化與複雜化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色之一。教育成就對個人職業的取得，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國家是背後的主要推動力。過去為了配合國家發展的產業政策，政府鼓勵職技教育機構的設立；在教育政策的引導下，所有的學生都經歷了職技教育和一般教育的雙軌「分流」歷程。進入大學窄門被認為是向上流動的最佳投資，從而引發了激烈的升學競爭；即使到了今天，大學的數目以足以容納所有的高中生，學生在教育過程承受的壓力依然未減，因為教育對未來的社會流動的影響力沒有降低，人們轉而追求優質大學的升學壓力依然難以排除。

代間社會流動深受勞動市場結構的影響。無論是性別、教育程度、年資、部門別、以及員工進入公司的初任職務，都對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勞動市場的性別差距，讓女性相較於男性報酬明顯地低上一些。在過去，以製造業和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因其升遷階梯（job ladder）較短，造成員工升遷前景的不樂觀，進而影響向上流動的機會。工作積累一定人脈和經驗的員工轉業或自行創業是常見解決向上流動瓶頸的方式，「黑手變頭家」蔚為風氣。1980年代在全球化推波助瀾、伴隨著製造業衰微的氛圍，企業紛紛採取彈性化經營的

管理策略，非典型的工作模式開始興起，對勞工的保障造成了衝擊。非典型工作型態對社會流動的影響，值得更進一步的觀察。

民國社會的流動：民國初年～38年

儘管清末民初時期的中國仍可算是一個農業社會，但以上海為代表的長江流域、東南沿海各地的城鎮，已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逐漸走向現代化、並納入全球經濟生產體系。相較於農村的產業停滯，都市裡近代企業開始萌芽，同時帶動金融業、運輸業等發展，人口聚集、都市化過程促成社會的階層流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在城市裡快速地興起。此外，地方仕紳與知識份子也群聚於都市中，轉向各種新興的職業。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造成這些人向上流動的固有管道消失，固有的仕紳階級快速分化，一些人成功地轉型成為民族資本家。

教育是工業化過程中社會流動的推動力。清末民初的中國教育仍未普及、文盲眾多。在都市化的過程裡，鄉村人口在流入都市後僅能從事低薪的人力勞動，淪為下層的貧困階級。這段期間雖然歷經了戰亂，各省市依然逐漸提供普及教育，提升國民的識字率和人力資本。在科舉廢除之後，中國開始推動新式教育，新式學堂取代了私塾成為官方的教育單位；除此之外，私立教會學校亦是相當重要的補充機制。少部份人遠赴美國、日本的國外教育機構留學進修，接受高等教育。持平而言，教育雖然提升了人力資本，但是此時接受教育的學費高昂，一般百姓難以支付，形成社會流動的障礙。在科舉制度下出身寒門或鄉村的子弟，相對上還有考試作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在新式學堂集中於都市，接受教育所需的學費、生活費與交通費用的多重負擔下，促成了貧富與城鄉的差距。儘管義務教育的推行，部分和緩了階層不平等的影響，然而這種差距，仍對個人取得教育成就造成相當大的限制。

基於當時戰亂的頻繁，從軍成為獨特的社會流動管道。民國初年各地的軍隊，民國 13 年在廣州成立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提供一個向上流動的管道。其中黃埔軍校採用大學的學制，黨校的性格，提供軍官在軍旅生涯與政府部會擁有

相當優渥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不過，高度動員的龐大軍隊若沒有安排妥當，容易在戰後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便曾面對棘手的軍隊除役問題。一方面國家利用警察特考等方式安置軍人，另一方面又限制軍人的退伍與婚姻。老兵後來成為台灣獨特的階層，衍生出不少的社會關注。

最後，國民政府本身便是另一個社會流動的管道，龐大的國家官僚體系直到二戰前後仍是國內知識份子重要的職業選擇。各項高普考試是官僚體系的選取標準，也體現個人教育成就的重要性。個人代間流動和官僚體制的升遷路徑息息相關，並受到政治因素的介入影響。

民國初年至 38 年的中國，社會流動是在相對不穩定的社會局勢下進行的。這段期間的社會流動面貌，相當不同於遷入台灣，在地緣政治下獲得穩定成長的在地社會。當社會隨著經濟成長興起的時候，勞動市場取代了軍隊或官僚體系，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場域。

社會流動與階層不平等

台灣在地理與歷史的特殊性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化的平台。台灣是一個新開拓的島嶼，除了地理上與中國大陸的分隔，主要的人口來自於近二、三百年來從中國沿海移民，中原文化與原住民族、平埔族的文化融合，型塑出獨特的邊疆性格；由於漢人的人數遽增、土地的快速開發，引發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以及閩客族群的資源競爭，產生了一個快速變動的社會，使得台灣社會一直都不容易形成固定的階層體系。自日本開始殖民台灣後，更加速拆解原有的地主與佃農的階層架構。在日治時期，農林依然是主要的行業，二次大戰後，民國 40 年代，台灣逐步啟動工業化的進程，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大幅降低農林業所需的人力，農村人口往城市求職，農村人口快速減少，鄉鎮與城市的工業及服務業從業人員日益增加。換言之，台灣社會階層化的特性是經濟結構的變遷造成快速的社會流動，提供向上流動機會。若從整體社會層級來看，白領與藍領工人階級有明顯的區隔；農人階級本身需要有農地與農業技術，而農地的取得又受限於法律規

範，因此家族的自我傳承特別明顯，具有一定的階級封閉性。民國 40 年代後至今，歷經數十年的快速變動後，階級分隔有轉趨明顯的跡象。這些社會結構上的變動，若從其他連帶面向來分析，可看出社會不平等的強化。例如，以階層間的所得差異來看，由於政府的發展策略曾經對農業部門的生產剩餘進行榨取，用以扶植工業部門的成長，讓農業收入日趨低於工業，大部分的農民必須兼業才能維持生計。另一方面，服務業的薪資及工作條件優於製造業，加上服務業包含有為數不少的公教人員以及其工作本身對教育有較高的要求，使得服務業有中產階級化的傾向。

社會發展產生了社會階層化，最明顯的是社會階層間的地位、財富與文化的變動所累積的差異。台灣社會由一個較封閉的農業社會，逐漸轉型成較鬆散的社會結構，再由鬆散到凝結的社會結構，除了實質條件的差異如職業、收入的分化之外，非實質的文化差異也將成為地位取得的因素之一。在人生過程中，個人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社會流動機會。以父母親的職業地位為主要因素的家庭出身背景在某種程度內仍然決定一個人的生命機會，影響個人的接受教育、繼承家業的機會。隨著教育的普及化，以及教育對於就業的重要性日增，這種差異遂透過教育機會的取得來維持其優勢。

學者的研究一再發現我國人民的成就與出身的關連性是持續的。家庭背景如父親職業、教育地位對於下一代子女的教育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父母親的資源雖然比較無法直接讓下一代取得較好的職位，卻可以透過教育的取得，而使子女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受惠。個人在後來的生涯中可以利用教育、初職的優勢地位來獲得勞動市場上報酬。相反地，若家庭無法使其子女獲得較佳的教育地位，則相對地這些子女在勞動市場上就會受到較差的待遇。總之，出生家庭對於個人的未來，特別是職業生涯的成就仍然有影響。研究也發現教育體制內一般教育和技職教育的雙軌分流，同樣存在不平等的現象；進入職技體系的學生，往往將來在職業地位的取得上有著較不利的位置。教育改革成為當前熱門的議題，除了降低升學歷力的目標外，降低教育資源配置不平等，也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勞動市場的升遷結構和工作型態，直接影響到社會資源分配的課題。理想上工作的薪資應反映出受雇者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高低，然而許多現實及社會因素造成了不平等的狀況。性別差異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即便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因素，兩性仍然沒有達到完全同工同酬的情況；即使獲得進修與訓練，女性報酬亦低於男性，升遷機會上也不及男性。勞資關係則是另一個影響資源分配的因素，普遍來說勞方處於較為不利的位置。當前台灣非典型工作有逐步成長的趨勢，但非典型就業的員工受到的福利與保障遠不及正職員工。同時非典型工作者並非企業的核心員工，因此向上流動的機會也受到了限制。而薪資差異擴大造成貧富差距增加的現象，也成為目前台灣所必須正視的議題。

社會流動的議題與社會公平息息相關。普遍來說，當一個社會強調能力來提供社會流動機會時，個人比較不會受到個人的出身背景的影響，這個社會比較公平、開放。反之，則是一個較不公平、較封閉的社會。儘管達到完全讓社會成員以自己的力量來成就自己的事業，也就是完全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現象。一個流動開放且平等的社會，是值得共同努力的目標。